



汉藏语学一代大家 邢公畹先生

阿错

今年是著名语言学家、汉藏比较语言学大家邢公畹先生诞辰110周年和逝世20周年。他与导师——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先生在汉藏语尤其是汉台语比较研究方面的学术传承,被学界誉为“两位语言学大师的接力赛”。

1914年10月23日,邢先生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先生对故乡满怀深情,在晚年的自述文章中,忆及幼时由父亲领着出安庆城东门,第一次看到长江,烟波万里,滚滚而来,气象恢宏,令他非常惊异。安庆城内建于南宋时期的双莲寺殿宇宽宏、花木清幽,也是先生幼时流连忘返的地方。早年对故乡景观的观察与省记,让邢先生认识了生长和哺育自己的故乡,形成了对故乡和祖国的山川风物、土地及人民的深沉执着的爱,成为他立志“探索宇宙间(包括人类社会)各种规律”的持久动力。

1937年从安徽大学毕业后,邢先生考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并受罗常培先生指导,接受了历史比较语言学、汉藏语学训练,并深入西南民族地区做语言调查。

1942年研究生毕业后,邢先生执教于西南联大中文系,同时在刚创建的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工作,成为研究室及《边疆人文》刊物的创始成员。这一时期邢先生深入滇西傣族聚居区等地区调查语言,发表了一系列历史语言方面的论著。1942年至1943年间,他在《边疆人文》上先后发表了《远亲兼种记音》《台语中的助词luk和汉语中的“儿”》《诗经》“中”字倒置问题》等9篇学术文章;同时又与罗常培先生合作,用古音拟注唐诗,油印出版了《唐诗拟音百首》,可谓硕果累累,奠定了南开大学中国音韵学、汉藏语学的基础。

1946年南开大学复校天津,次年邢先生任南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51年升任教授,1956年招收语言方向副博士研究生。上世纪50年代随着院系调整,邢先生在中文系组建了汉语同语系研究室,1981年成为我国首批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这也是我国首批语言学博士点中唯一的少数民族语言学专业,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第一个博士点专业,邢先生也成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

南开大学至今都是国内综合大学中少有的保持强大民族语研究力量的高校,也是中国唯一拥有八十余年民族语研究史的高校。不仅是邢先生,老一辈语言学家如刘叔新先生、马庆株先生等,也都同时研究汉语和民族语。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结合,历史研究与共时研究结合,南开大学是国际汉藏语比较研究的重镇,邢公畹先生居功至伟。

1953年至1956年,邢先生受国家委派



邢公畹先生 学术研究、翻译及文学创作代表作

赴苏联,先后任莫斯科东方学院教授、莫斯科大学教授,成为新中国对外汉语教育的先驱。1956年2月,苏联高教部特聘他任汉学家波兹涅娃(Л. Д. Позднеева)博士论文答辩会的首席论文评论员。

邢先生以深厚的“小学”功底,启用古老丰富的汉语文献,结合深入田野调查的民族语资料,在汉藏语比较研究方面作出重大贡献。“文革”后复出,负责“汉语”部分;主编了南开版独具特色的《现代汉语教程》和《语言学概论》等教材。同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所创立的“同源体系”——“语义学比较法”,为汉藏语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邢先生不但国学修养深厚,研习多种民族语言,而且通晓英文、俄文,十分留意和吸收国际前沿学术信息。早在1947年,他就发表了署名Hsing ching-lan的英文论文Notes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Nung and Lu Languages in Lo-ping(《罗平依语和傣语比较研究札记》)。后来又从俄文翻译波兹涅娃(Л. Д. Позднеева)著作《红楼梦》(为联的中国文学研究),从英文翻译李方桂《阿侬语概论》等文献。1979年,邢先生与庞秉钧等学者合译出版了乔姆斯基(N. Chomsky)的《句法结构》一书,将这部20世纪语言学里程碑式的著作首次介绍到中国大陆。

1990年,法国著名语言学家沙加尔(L. Sagart)首次提出汉语与南岛语同源说,邢先生十分关注,连续在《民族语文》(1991年第3、4、5期)发表评述修正的文章,进而提出“汉藏泰澳语系”学说。1992年,沙加尔发文应答邢先生,接受先生指正多处,并进一步讨论有分歧的地方。1998年11月,沙加尔专程赴天津邢先生寓所与他研讨。两位国际汉藏语学大家的此番对话,后来发表在《民族语文》上。

新世纪之交,年届八旬有半的邢先生老而弥坚,学术研

究更加炉火纯青,在人生最后几年发表了二十多篇重要的学术文章。这一时期邢先生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令人惊叹。邢先生90岁高龄与癌症搏斗至病逝前,仍不断有论著发表。1999年,85岁的邢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集毕生研究之大成的巨著《汉台语比较手册》,继承李方桂先生的汉台语比较研究,揭示了九百余组汉语、台语音义对应“关系字”,将汉台语比较研究推动到前无古人、后人难及的地步。著名语言学家王均先生在评价邢先生继承李方桂先生学术、将汉台语比较研究推向前沿时说:“这是两代语言学家、两位语言学大师的接力赛。”

1998年至1999年,邢先生在美国汉藏语学家柯蔚南(W.S.Coblin) A Sinologist's Handbook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汉藏语词汇比较手册》)基础上,又在《民族语文》连续发表7篇“汉藏语系上古音同源字考”系列学术论文。后来综合整理成为《汉藏语同源词初探》,于2001年出版。以汉语上古27个韵部为线索,详尽比较辨析了覆盖汉语、侗台、苗瑶和藏缅四大语族的大量同源字组,将其毕生之功治汉台语比较研究的成果进一步推广到全部汉藏语系语言,并以此论证“美国学者白保罗(P.K.Benedict)建立的排斥侗台苗瑶语的汉藏语系的假说不可信”。当然邢先生同时也肯定了白保罗提出的台语与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的学说,并成为他提出“汉藏泰澳语系”学说的重要基础。

2000年,《邢公畹语言学论文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邢先生一生代表性的重要学术论文。2003年《语言研究》第一期发表的《论“汉台苗语”调类的分化和再分化》,是邢先生生前发表的最后的一篇学术论文。如今,收入先生主要论著的十卷本《邢公畹文集》也正向南开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邢先生已深为癌症所困,却仍不忘学术研究。仅在最后一年里,他在不断的手术与病痛之间,还撰写了两篇文章,包括重新用汉语翻译60年前在云南用国际音标记录的傣族故事《阿叶哈毫姑娘的故事》,最终在他身后发表。

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学去医院探望,适逢邢先生精神略微好转,仍念念不忘与我们讨论学术问题。他对我们说:“对于认定的学术理念要有执着坚定的信念,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轻易放弃。”当此之时,先生正值身患重疾,病魔几在旦夕之间;斯时斯刻,国内外学界对先生的汉台语同源观念或方法也有不少质疑和批评;然而先生平静地说坚信自己的学术信念。此情此景让我们感到十分震撼。

邢先生博学多才,视野开阔,绝非迷固执之人。他特别强调学术要突破“境界”,常以荀子“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而迁”自励,说“如蜕者,如蛇蜕之蜕也。旧之所学,如拘泥于壳内;所得日多,则破壳翻然离去,境界异矣”。他不断吸取国际学界最新信息,以深厚的“小学”功底治汉藏语历史比较,以惊人的毅力不断否定自己、开拓前进,愈老弥新,始终站在学术前沿。

人们或许会诧异,科学研究当根据客观理据,何来“信念”指引?殊不知当一个学者已经站在科学研究最前沿,面对的是人类尚未知晓的世界,恰如直面黑暗独自探索,前方并无既成的道路与光明,那么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这时候丰厚的学养带来的科学直觉——即学术信念,正是指引先驱者开拓前进的旭日明灯。

邢先生多才多艺,爱好广泛。喜欢拉小提琴,诗词也多写得好,书法被认为“不从一家而颇具赵(孟頫)风”。邢先生早年尤其擅长文学创作,17岁时就在《安徽教育》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春天的下午》,锋芒初现。其后在多家报刊上发表过一系列小说、散文,与沈从文、废名、萧乾、汪曾祺等同被称作“京派小说家”。195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说集《红河之月》;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京派小说选》,选有他(署名邢楚均)的小说《梅村匠》。

“学贯古今,视中春秋五十;薪传南北,帷下弟子三千。”1988年邢先生执教50周年之际,南开大学赠送的荣誉证书这样写道。如今先生的亲炙弟子都已独当一面,续写着先生开创的学术事业的辉煌。石锋、曾晓渝、洪波、石林、张旭、邢凯、薛才德、袁明军等都是当今语言学领域重要学者。石锋的语言格局和实验语言学系列成果,曾晓渝的汉语与侗台语历史比较和语言接触研究,洪波的汉语语史研究等在学界有着重要影响。在南开执教的施向东尽管不属邢先生亲传弟子,但他采用和发展邢先生的同源体系比较法,在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方面取得杰出成就。

2004年7月7日,邢公畹先生在天津与世长辞,终年90岁。先生一生以全部的身心执着地实践自己的科学信念直至最后一刻,这深令我们感动,同时给予我们以巨大的鼓舞。此生有幸聆听先生的教诲,实在是我辈终身的荣耀。

(本文原稿较长,刊出有删节。作者系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藏语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学人小传

邢公畹(1914—2004),名庆兰,生于安徽安庆,祖籍江苏高淳。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藏比较语言学大师。历任西南联合大学教员,莫斯科东方学院教授,莫斯科大学教授,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曾任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中国民族语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务。在汉藏语研究领域有重要影响,在语言理论、古今汉语音韵、语法诸研究领域皆有学术贡献。

满庭芳

第五二九七期

观山西省陵川县挂壁公路

削崖挂壁云中绕,凿洞攀崖参日交。陡路急驰发吼啸,盘弯直下起狂飙。穿通叠嶂平川阔,突破重围放眼高。当代愚公多壮志,穷山今作幸福桥。

题河南林州红旗渠景区

人造天河创大观,精神永驻策长鞭。

2013年,为纪念次年将迎来作家梁斌先生百年诞辰,我接到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梁斌红色经典三部曲”(《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连环画脚本的任务。光阴飞逝,虽已过去十余年,但那段写作期间的心路历程至今难忘。

老实讲,当时的我对于梁斌先生及其作品的了解仍然还停留在学生时代的课本上。接到如此重要的任务,我内心激动之余,更有一份忐忑,生怕自己才疏学浅,辜负了出版社的信任。面对眼前的考验,我唯有排除一切杂念,首先静下心来,深入而仔细地品读梁斌先生的皇皇巨著。

此后一个星期里,我完全沉浸在梁斌先生描绘的宏大而壮阔的农民革命画卷中,与书中的主人公们同呼吸共命运,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难忘虎子和父亲朱老巩不畏强暴,守护在大铜古钟前的伟岸身姿;动容于运涛和春兰在瓜园小窝铺里互诉衷肠时的浪漫;为“七·六”惨案中无数革命青年的牺牲而扼腕;热血沸腾于高蠡暴动中朱老忠父子的舍生忘死;更为三部曲最后开放式的大结局而意难平……凡此种种,读来掩卷,久久不能释怀。不知不觉,我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将这三部小说反复读了若干遍,每多读一遍,就会有新收获、新感悟。随着素材积累的日趋扎实,更有一份责任感促使我必须将这三部曲的脚本写好,用简洁易懂的形式将梁斌先生的经典之作讲述给更多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这也是出版这套连环画的初衷。

读完书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又面临一个困难,那就是如何下笔的问题。要将梁斌先生这三部鸿篇巨制浓缩成方寸之间的精炼文字,难度可想而知。首页开篇更是重中之重,马虎不得。为此,我决心继续精读原著,只有从梁斌先生留下来的文字中才能找到答案。终于,在一段又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里,从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活的人物中,我真切感受到了先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故乡这片热土的浓厚深情,以及他对国家和人民寄托的美好希冀,这才是三部曲一脉贯穿之魂之所在。于是,万事齐备,在一番字斟句酌后,我终于满怀自信地在电脑屏幕前敲出了“梁斌红色经典三部曲”连环画脚本的第一段文字:“广袤的冀中平原,滚滚东流的滹沱河水哺育着锁井镇四十八村。弯弯曲曲的千里堤上有一座河神庙,庙台上两棵柏树下,矗立着一座两人来高的大铜古钟。一个少年来到古钟旁,伸出指头蘸上唾沫,描绘着大钟上雕刻得琳琅满目的花纹,呆呆地出神。这少年名叫朱虎子,今年十五岁。”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仿佛接过了梁斌先生传递过来的接力棒,一曲生在冀中平原上的壮丽革命史诗,在我的全新讲述下娓娓道来。我相信这是梁斌先生给予我的创作灵感。后来我才知道,梁斌先生开始创作

我为梁斌作品 连环画写脚本

晏思鉴



《红旗谱》的时间是1953年6月,竟与我开始撰写三部曲脚本的时间整整相隔了一个甲子。不禁感慨,这莫不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写作期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专门举办了梁斌文学艺术专题讲座,大家有幸与梁斌先生的后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了解了很多先生的逸事,令我对先生有了更加全面立体的认识。这为我之后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文学也许注定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小说中,芝儿为父报仇后一骑绝尘,从此不知所踪;江海和严萍的坎坷爱情之路将何去何从;冀中平原上的抗日斗争又会是怎样一番轰轰烈烈的景象?为此,我在完成三部曲脚本后的一段时间里仍无法走出书中的世界,更是自不量力地想要续写后面的故事,还曾拟出了《战寇志》《解放歌》两部书名,最终因自己的能力不足而作罢。如今想来,实属笑谈。梁斌先生为读者留下了永远的想象空间,这正是文学的另一重魅力。

梁斌先生是为文学而生的,他的创作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支撑他旺盛创作激情的,除了对文学的挚爱,更有对党、对革命事业的一腔热血和无限忠诚。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感动并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国人,不仅因为高超的文字功力,更因为他将自己深深融入他所热爱的人民中,用文学的方式抒发亘古不变的家国情怀。伟大的文学作品不会被时代遗忘,无论历史如何变迁,社会如何发展,梁斌先生的文学创作精神永远是文学创作者们理应继承并发扬光大的。

(注:“梁斌红色经典三部曲”连环画2014年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共10册,其中《红旗谱》4册、《播火记》3册、《烽烟图》3册。)

诗三首

王海福

观河北盐博物馆

煮海开端百味鲜,华堂尽览域中盐。纳潮流泻嘉淑提,掘井煎石展玉滩。鹼卤黄骅三眼灶,丝绸古道九州繁。桑公官论矜全废,庶众盘餐大过天。

《丛林大冒险》: 探讨夫妻关系的喜剧探险片

曹宇田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上班族,有一天突然掉落在无人的丛林海岛,没有指南针、手机没信号,甚至没有一件能用的工具,遭遇恶劣环境、毒蛇猛兽,甚至还有食人族!怎样才能活下去?

到了雨林,你要面对的第一关就是危机四伏的环境,渡河可能会遭遇水蛭,找不到干净的水源……适应环境这第一关,就能够摆倒绝大部分冒险者,但这只是最基础的一关。在未知的土地上,也许你需要在雪地里打败黑熊,也许在丛林里藏匿着高达数米的大猩猩,当然了,遇见恐龙也不稀奇。

如果说这前两轮还能凭借技巧和运气侥幸闯过,那么遇见了人类,尤其是无比熟悉这里一草一木、周遭环境的食人

族,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巨大挑战? 本周推介的佳片就和野外冒险有关。一对夫妻流落到一个海岛,不仅能够生存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且还从食人族手中死里逃生。这就是2012年上映的俄罗斯影片《丛林大冒险》。

玛丽娜曾经是一名优秀的神射手,在邂逅了建筑师谢尔盖之后,她决定放弃自己的事业,和谢尔盖携手步入婚姻殿堂。一晃三年过去了,谢尔盖忙于工作,经常忽略玛丽娜,两人感情出现危机。为了改善夫妻之间的关系,谢尔盖带着玛丽娜前往热带岛屿旅游,但同时也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看到一场美好的旅行屡屡被各种各样的电话打断,玛丽娜忍无可忍,于是两人之间的一场较量拉开了序幕。但让



夫妻二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这座小岛上还生存着一个无知野蛮的原始部落……

本片讲述的故事看似很荒诞,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夫妻二人被岛上居民献祭,甚至坠海,但都毫发无伤,一点都不讲科学。这部电影其实是借助丛林冒险来探讨夫妻之间的关系,失落海岛的危机反倒成了他们夫妻关系缓和的救星。在一起久了,可能会忽略,其实夫妻二人并非敌人,而是一起面对生活中各种挑战的“盟友”。

10月26日22:20 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丛林大冒险》,10月27日15:56“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鲁迅初到北京的喝酒场所,除了广和居、同和居、便宜坊、南味斋等馆子,在许寿裳住所也喝过多次,《鲁迅日记》中常有“夜饮于季市之室”的记录或类似的记录。1912年6月19日日记:“夜饮伯、季市招我饮酒。”7月17日:“晚饮于季市之室。”7月30日:“饭于季市之室。”8月10日:“晚小饮于季市之室。”8月16日:“夜饮于季市之室。”8月28日:“晚招孙来,大饮于季市之室。”如果算上许寿裳之兄许铭伯的招饮,那次数就更多了,如8月19日旧历七夕节和10月25日中秋节。不过许铭伯的招饮,许寿裳大多都在。统计一下鲁迅初到北京在日记里明确记录的饮酒,从1912年5月7日到9月30日止,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共饮酒25次,

来补充。”但是终究是吃不好(或还有其他原因),正巧许寿裳新找了一间房子,招鲁迅、周作人等人去同住。周作人在《晨报》上写了一节写道:“总是五个人,门口路灯上便标注曰:‘伍舍’……那房子的确不错,也是曲尺形的,南向两间,西向两间,都是一大一小……鲁迅与许季市和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太炎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往在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即许季市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祖、朱宗莱……总是八个听讲的人。”鲁迅和许寿裳的关系,就是在不断的交往中越来越亲近起来的。

许寿裳回国后,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1911年他任职于教育部(南京),还介绍鲁迅也入教育部,北迁之后,和鲁迅几乎同时到达北京,也住在绍兴会馆。由于鲁迅和许寿裳当年在日本留学时建立的友谊,加上两人观点相同,性格相似,又是同事、同乡,几乎整天形影不离,一起上下班、逛琉璃厂,一起看书、淘书、买点和心和生活日用品,到吃饭时便喝几杯酒,也就是日常之事了。那么,“夜饮于季市之室”的菜肴,不知是会馆的长班代烧的,还是从广和居叫来的,从早期的鲁迅日记中,约略能看出些端倪来,如1913年1月19日鲁迅日记:“季市烹一鸞招我午饭,诗荃亦在。”能在自己的住室“烹一鸞”,那是自己开伙了,至少有些做饭炒菜的设备。鸞是什么呢?鲁迅在日记里用了古称,实际上就是鸭子,准确地说,是野鸭。因为古语称兔为家鸭,鸞为野鸭。如前所述,鲁迅和许寿裳同在章太炎名下听国学讲座,开首就是听讲《说文解字》,肯定是熟知了,“鸞,野兔也”。《太平御览》引《说文》就是这么说的。李巡疏曰:“兔,家鸭名;鸞,野鸭名。”和鸞组成词的,除好高鸞远外,也多冷僻,如“鸞列”,指如鸭排列成行;如“鸞龄”,指鸞形的小船;再如“鸞没”,指如鸭潜没于水中。这些词现在都不太常用了。唐代文人王勃在《滕王阁序》里,有一句“落霞与孤鸞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为世人称道。在隆冬之夜,许寿裳得到一只野鸭,在火炉上煮炖一锅,正巧又有朋友在,恰好又是星期天,便请好友鲁迅一起围炉吃鸞,也是美事一桩。

在季市处吃鸞不止一次,后来还有,如1913年2月5日鲁迅日记:“午后同齐寿山往小市,因风无一地摊,遂归。过一骨董肆,见有胆瓶,作红色,虽微瑕而尚可爱,云是道光窑,因以一得之……季市招饮,有蒸鸞、火腿。”逛了古董店,买到好玩的胆瓶,又喝酒吃鸞,那就美事成双了。这里“蒸鸞”的鸞,有可能是腌鸭,也有可能是许寿裳的家人或朋友从绍兴寄来的,因为吃过这次蒸鸞,到了2月10日那天,许寿裳还赠火腿一块给鲁迅,大约是鸞有不少土特产。

总之,夜饮于许寿裳的住所,包括端午节、七夕节和中秋节,都到刚到北京不久的鲁迅带来许多乐趣和安慰。

生活中的鲁迅(十二)

“夜饮于季市之室”

陈武

平均一个月约5次,不算密集,也不算稀少,而在“季市之室”的饮酒,不过是这几次饮酒中的一个小小插曲,因两人特殊的关系,便颇值得一说。

许寿裳生于1883年,比鲁迅小两岁,鲁迅日记中所写的“季市”,是他的字“季市”的简写,他还有一字曰“季市”。许寿裳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官费赴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与鲁迅成为同学,遂成为好友。二人曾一起支持在日本的河南省留学生办的综合月刊《河南》,并在上面发表文章,鲁迅在第七期上发表的文章题目叫《文化偏至论》,认为兴国的战略方针,须先立人,“是故将生存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人而轻精神。”鲁迅的观点,许寿裳也非常赞赏,他在第四、第七期《河南》上发表未完文章《兴国精神之史观》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兴国不在政府而在国民,不在法令而在自觉,非然者虽有政府,而民与国未尝有毫发关系焉。”二人几乎是一唱一和了。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所记,在日本时,鲁迅和许寿裳等人同住在中越馆,鲁迅和周作人等人对于中越馆的伙食很不满意,周作人举例说:“有一种圆豆腐,中间加些素菜,径可两寸许,名字译作云素天鸭肉,本来也是很可以吃的,但是煮得不入味,又是很日两天的,真有点吃伤了,我们只好随时花五角钱,自己买一个长方罐头盐牛肉